

# 谁在随爱而动？\*

——大城市外来人口婚配特点的实证研究

高颖 彭宇

**摘要:**本研究以北京2004-2012年的婚姻登记数据为基础,对外来初婚人口的主要特征及其婚配特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迁移人口和辗转到北京的流动人口在教育水平和职业序列上普遍分布在较高层级,与当地人的婚配比重不高且多为“强强结合”的婚配模式;一次流动人口则对本地的弱势群体婚配形成一定补充。在婚姻与迁移的决策中,女性并未显著表现为追随的一方;男性流动人口亦为数不少,并有越来越多的男性辗转流动到北京。

**关键词:**外来人口 迁移人口 流动人口 婚姻匹配 北京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在我国已持续20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逐渐成为人口流迁大潮的主体。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促进了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大,也为通婚圈的拓展和跨地域通婚创造了有利条件。传统观点通常认为,婚姻是导致迁移的生命事件,且女性往往是被动随迁的一方。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婚姻与迁移二者之间越发表现为一种互为存在、彼此促进的关系;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之下,婚姻可以是实现迁移的一个途径,亦可能是流动中的一种人生收获。

从人口流迁的空间特征来看,大城市因其发达的经济水平、多元的文化观念和较多的职业发展机遇等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口。以北京为例,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外来人口在北京市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且以青壮年人口为主<sup>①</sup>。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改变了大城市整体的人口结构,也改变了当地婚恋市场的结构,为青年男女的婚配提供了更多选择。对于大城市外来人口婚配特点的实证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近年来大城市总体的婚配状况和发展趋势有所了解,同时也进一步明晰当前人口流动与婚姻决策之间互动关系的特点。

## 一、文献回顾与述评

在有关人口流迁问题的研究中,主流的假设是男性为迁移的主体,而男性主要因经济动机迁移,女性主要因社会因素迁移,婚姻是女性迁移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传统观念通常认为,婚内男女的权力存在差异,有所谓“男主外女主内”之说,即丈夫在外挣钱工作比较重要而妻子肩负着照顾家庭和子女的责任;劳动力市场中持续存在着性别工资差距,这些因素均使得女性更易成为被动迁移的一方(Mulder & Wagner, 1993)。基于父权制理论的研究指出,女性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更可能为追求经济稳定和福利而结婚;婚姻不仅是双方交往的结果,而且是达成某种目标的方式和途径,当这些目标涉及到地区转换时,婚姻便成为实现迁移的工具而非目的(Willekens, 1987)。不少实证研究印证了上述观点。针对跨国婚姻的研究发现,泰国女性为摆脱贫穷、支持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而嫁给德国男性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及管理研究”(项目号:71133003)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近年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项目号:13SHB012)的支持;同时感谢北京市民政局计算机信息中心的数据支持。

① 《北京人口10年增44.5%外来人口比重升至35.9%》,参见《凤凰网》(<http://city.ifeng.com/cshz/bj/20110505/84018.shtml>)。

(Humbeck, 1996);来自朝鲜、泰国和菲律宾的女性为了获得安全、合法的居住和工作身份而嫁给日本男性(Piper, 1999),在中国东北的延边地区亦有相当多的朝鲜族女性以自己的“青春”换取韩国男性的“优越居住资源”,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延边的对韩通婚数量便急剧下降(林明鲜、申顺芬, 2006);针对特定地区婚姻迁移的研究也发现婚姻与利益之间的类似关系,比如印度的农村家庭倾向于把女儿嫁给远亲以缓和收入风险(Rosenzweig & Stark, 1989),尼日利亚农村的女性更希望嫁给城市的男性(Watts, 1983),等等。

上述论断虽然对“婚姻是相互爱慕基础之上的结合”这一经典认知形成挑战,但事实上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婚姻决策也是一个充分考虑现实并权衡各种利弊而选择的结果。婚姻梯度和社会交换理论对此给出了比较有力的解释。一方面,男性在婚配过程中倾向于同各方面条件略低于自己的女性结合,即采取“男高女低”的“向下婚”模式(Bernard, 1982);另一方面,作为理性人的男女双方又试图通过“交换”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而实现“互惠”,从而在婚姻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男方的资源通常体现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而女方的优势往往在于年龄、相貌和气质(Blau, 1964; Becker, 1973)。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跨越地域空间的通婚一直以来都存在(比如农村地区不同村落之间的联姻),且婚姻决策过程中亦会考虑到实用性和交易性的功能,包括延续家庭血脉、充实劳动力资源、提供养老保障等等;女性在择偶时普遍遵循“高嫁低娶”的原则,婚姻是女性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Lavelly, 1991; 雷洁琼, 1994)。

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激发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同时跨越省区的长距离婚姻迁移也不断增多(周皓、李丁, 2009; 宋月萍等, 2012);由于“乡—城流动”始终是人口流动大潮的主体,再加上女性通常在婚姻中处于从属和弱势的地位,因此大量的关于婚姻迁移的研究都聚焦于农村女性,将其默认为跨地域通婚中被动追随的一方。事实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开放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求独立和自我发展,并因经济原因而迁移(Fan, 1999; 蔡昉, 2002);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统计结果表明,相比于第四次人口普查,“务工经商”已经取代婚姻成为女性跨省迁移的首要原因(范芝芬, 2013);一项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则发现,广州的异地婚配中,外来人口的男女比例相当,且城市男女的婚配比例更高,此外这一群体在文化程度、收入等方面的特点与城乡之间的婚配有显著不同(倪晓峰, 2007)。可见近年来以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为婚姻迁移主体的模式已悄然发生转变,在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以及流动人口类型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有人“以婚求动”,有人“动中成婚”,且在性别对比上也不再悬殊。

大城市通常是外来人口的高度汇集之地,首都北京的外来人口更是来自全国各地。本文将针对北京市外来人口及其婚配特点展开研究,从而为了解我国当前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婚配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向提供参照,另一方面也为相关领域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

## 二、数据基础及处理方法说明

### (一)数据来源及简要介绍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其中包含了自2004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9年中共1,708,260对夫妇的信息;本研究主要使用其中的1,319,172条结婚登记记录进行分析(占比77.22%,其余为离婚登记记录和补发补办证件的记录)。

目前针对人口、婚姻等问题的量化研究大多选用人口普查数据或者针对特定地区和群体的抽样调查数据,与上述两类数据相比,婚姻登记数据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全面性和准确性,同时更加适合动态研究的需要。普查数据或抽样调查数据通常是对调查时点的横断面状态的扫描,即某一婚姻状态的人口数量是过去多年累积变化的结果;而婚姻登记数据准确记录了各个时点(每一天)的新婚人口状态,有助于我们客观、动态地把握现实情况。此外,该数据库包含了最近9年在北京进行婚姻登记的所有夫妇的完整记录,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总体而非抽样的样本,避免了

抽样调查中最为常见的样本偏差问题,从而为我们准确了解各类婚配行为的总体状况和特点提供了重要保证。

## (二) 重要变量及处理方法

对于“外来人口”的界定,本文主要利用数据库中的夫妻双方“身份证号码前6位”和登记时夫妻双方的“户口所在地”这两个字段<sup>①</sup>对人口类型进行区分。

按照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在北京进行婚姻登记的夫妇中至少有一方的户口所在地为北京,因此所有的结婚登记者根据其登记时刻的“户口所在地”可以被划分为“北京户口”和“京外户口”两类人群;而在“北京户口”的人群中,有些是北京本地人,还有一些是外省市迁入北京落户的,这一点主要根据“身份证号码前2位”(标识了身份证办理时刻的户口所在地)进行判断。由于数据库中的初婚者绝大多数为1970年代及之后生人,年纪最小的生于1992年,基本上是在年满16周岁之际办理的身份证,因此身份证号码的前2位所反映的应是其原籍所在地或主要的婚前居住地。这样,在北京进行结婚登记的人群可以划分为三类<sup>②</sup>:(1)北京本地人口,户口所在地和原籍均为北京;(2)迁移人口,由外省市来到北京并已将常住户口迁移到北京的人,具有北京户口但原籍非北京;(3)流动人口,户口所在地不在北京<sup>③</sup>。流动人口中又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原籍和户口在同一地区,还有一种是原籍和户口分在两地(比如原籍在河南,后来落户到广东,然后又到北京来登记结婚);为论述方便起见我们称前者为“一次流动人口”,后者为“辗转流动人口”<sup>④</sup>。另外以本数据库所涉及人群的出生年代来看,外来人口的户口所在地的变化(从原籍到户口所在地)基本上是因就业(对在校生来讲是因求学)而发生的<sup>⑤</sup>。

本研究主要采用大数据挖掘的统计分析方法,以北京本地人口为对比基准,考察外来人口(包括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和婚配特点。研究中涉及的其它重要变量还包括年龄(基于出生年份计算)、教育文化程度、职业类别等等。考虑到再婚人群和涉外婚姻的特殊性,本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大陆地区的中国籍初婚人口。

## 三、初婚外来人口的主要特征

### (一) 各类人口数量的时序变动

基于婚姻登记数据库的总体统计显示,在2004-2012年的9年中,在北京登记结婚的初婚男性和女性中分别有外来人口369,137人和535,411人,分别占比35.8%和49.1%;外来人口中男性以迁移人口为主而女性以流动人口为主。通常来讲,特定地区的婚姻市场应以本地人为绝对主体,但在北京的初婚人口中,外来人口比重相当可观。

① 本研究严格遵照研究伦理的要求,在提取数据时只截取身份证号码的前6位,其余变量也均不涉及任何个人隐私信息。

② 对于持护照登记的出国人员和持军官证、士兵证的登记者,我们无从对原籍等相关信息做出判断,因此这部分记录不包含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中。

③ 还有一种情况是“迁出人口”,即原籍为北京但户口不在北京,但数据库中具有这一特征记录极少,因此我们未将其包含在研究对象中。

④ 事实上迁移人口中也有“辗转迁移”的情况,即先从原籍地落户到非北京的某个省区,后来又落户到北京,但由于在婚姻登记这一时点其户口已经迁入北京,之前的过程我们便无从了解了。

⑤ 就业、婚迁和随父母迁移是户口发生地区转移的三条最主要途径,由于本数据库记录的是结婚这一时点(且本研究考虑的是初婚人群)的户籍状态,因此排除了婚迁的可能性;又由于本数据库的人群按照出生年代来讲应当是在年满16周岁时办理的身份证(据此确定原籍,即最初的户口所在地),而在16岁至结婚期间随父母迁移的可能性也极小。因此,辗转流动人口的户口转换以及迁移人口的户口入京基本因就业而发生。

表 1 北京近年各类初婚人口的数量分布及变动 (%)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总体
男性	本地人口	70.12	68.40	68.01	64.63	63.51	63.44	61.41	60.70	61.16	64.21
	迁移人口	18.36	18.16	19.19	20.85	21.64	21.55	23.08	24.38	24.24	21.57
	流动人口	11.53	13.44	12.8	14.53	14.85	15.01	15.51	14.92	14.60	14.22
	#一次流动	9.97	11.77	11.07	12.64	12.80	12.84	13.35	12.65	12.31	12.21
	#辗转流动	1.56	1.67	1.73	1.89	2.05	2.17	2.16	2.27	2.29	2.01
	合计	93907	72031	133507	88328	114446	144046	107352	139128	138653	1031398
女性	本地人口	55.69	51.21	54.28	49.30	49.00	49.94	48.41	49.80	50.79	50.90
	迁移人口	13.72	13.17	14.39	15.11	15.57	15.49	14.69	16.36	16.82	15.20
	流动人口	30.59	35.62	31.33	35.59	35.43	34.56	36.91	33.84	32.39	33.90
	#一次流动	28.39	33.37	29.09	33.06	32.78	31.84	34.04	31.05	29.79	31.34
	#辗转流动	2.20	2.25	2.24	2.53	2.65	2.72	2.87	2.79	2.60	2.56
	合计	100070	77870	143773	95364	122511	153633	112134	143032	142064	1090451

注:为简化表式,仅在“合计”一行给出了频数,其余各行均为列向百分比的数值,具体的频数可通过计算得到。

表 1 具体展现了 9 年间各类人口的分布及时序变动情况,可以看到迁移人口的比重一直保持着上升的趋势,流动人口的比重则在 2011 年左右出现反转的迹象,这一变化是与北京人口总量的结构变化特点相一致的,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1 年北京市暂住人口比 2010 年减少了 60 万人<sup>①</sup>;2012 年年末全市户籍人口比上年末增加 19.6 万人,而暂住人口则比上年减少了 41.6 万人<sup>②</sup>。

流动人口中以一次流动为主且以女性居多,但从辗转流动者的情况来看,9 年中初婚男女辗转流动人口分别为 21,659 人和 27,915 人,二者的数量差别并不悬殊,且男性辗转流动人口的比重在持续上升。可见在婚姻迁移的决策方面,男女双方的主动权趋向平衡,面对家庭与个人发展的抉择时<sup>③</sup>，“随爱而动”的未必是女性一方,男方也可以为了婚姻和家庭而再次迁移。

## (二) 外来人口的地域分布

北京的外来人口来自全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表 2 针对其地域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并按照全国 7 大地理分区进行归并计算。从表 2 数据可以看到,外来人口较为集中地分布在近京的华北、华东、东北及华中地区,这一特点在一次流动人口中的表现更为突出。

相对而言,辗转流动人口的原籍所在地分布最为分散,且与其户口所在地的分布具有明显差异。与原籍所在地相比,辗转流动人口的户口所在地为天津、河北、上海、广东等地的比重均有大幅提升<sup>④</sup>,可见这一人群最初的流入地选择并非北京,很多人在因婚姻赴京之前首先经历了一次从原籍到经济发达地区(比如上海、广东、天津)或北京邻近地区(比如河北、天津)的迁移。就本研究所针对的初婚男女青年而言,如果说辗转流动人口更多的是“因婚而动”,那么一次流动人口则既可能是“因婚而动”,也可能是“动中成婚”。

① 《京城居不易 60 万人挥别》,参见《经济观察报》(<http://www.eeo.com.cn/2012/0903/232935.shtml>)。

② 《北京市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参见《北京统计信息网》([http://www.bjstats.gov.cn/xwgb/tjgb/ndgb/201302/t20130207\\_243837.htm](http://www.bjstats.gov.cn/xwgb/tjgb/ndgb/201302/t20130207_243837.htm))。

③ 这里我们不妨假定,夫妇登记结婚的城市通常也是其日后定居的城市。

④ 重庆的比重也有大幅提升,但主要源自 1997 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而引致的人口户籍从四川到重庆的转换,这种户籍变动可视为非主动选择性的人口迁移。

表 2

初婚外来人口的地域分布

(%)

		初婚男性				初婚女性			
		迁移人口 原籍	一次流动 原籍/户口	辗转流动 原籍	辗转流动 户口	迁移人口 原籍	一次流动 原籍/户口	辗转流动 原籍	辗转流动 户口
华北	天津	2.35	2.54	1.44	13.13	2.73	2.18	0.90	14.04
	河北	14.11	23.72	9.52	13.04	15.90	30.00	9.69	16.05
	山西	6.28	5.00	5.69	1.61	7.12	3.99	5.60	1.75
	内蒙古	3.55	4.98	4.52	0.96	4.39	4.33	4.89	0.96
	小计	26.29	36.24	21.17	28.74	30.14	40.50	21.08	32.80
华东	上海	0.32	0.49	0.37	7.70	0.17	0.30	0.13	5.97
	江苏	4.07	3.25	3.67	5.17	2.86	2.36	2.01	4.19
	浙江	1.94	1.37	1.55	3.75	1.65	0.93	1.16	2.61
	山东	12.20	9.91	8.50	6.35	10.55	9.14	7.52	4.70
	安徽	4.02	3.69	3.62	1.19	2.45	3.07	2.67	0.71
	小计	22.55	18.71	17.71	24.16	17.68	15.80	13.49	18.18
东北	辽宁	5.92	6.27	4.70	6.01	6.99	5.58	4.53	5.35
	吉林	4.28	4.69	5.03	1.89	5.47	4.04	5.19	2.16
	黑龙江	5.75	8.18	7.06	1.86	7.30	6.87	8.37	1.85
	小计	15.95	19.14	16.79	9.76	19.76	16.49	18.09	9.36
华中	湖北	5.53	3.55	5.40	3.25	4.60	4.02	4.96	2.91
	湖南	3.74	1.97	3.38	1.23	3.51	2.85	3.68	1.68
	河南	7.40	6.30	6.81	1.82	6.50	6.91	6.67	1.96
	江西	2.91	1.77	3.11	0.89	2.16	1.37	2.46	0.87
	小计	19.58	13.59	18.70	7.19	16.77	15.15	17.77	7.42
华南	广东	0.60	1.18	0.36	15.23	0.48	0.67	0.32	10.78
	广西	0.69	0.49	0.77	0.61	0.92	0.66	0.85	0.66
	福建	1.51	1.18	1.27	1.33	1.09	0.67	0.85	1.35
	海南	0.18	0.15	0.23	1.10	0.19	0.14	0.33	0.90
	小计	2.98	3.00	2.63	18.27	2.68	2.14	2.35	13.69
西南	四川	3.69	2.10	6.89	1.53	3.57	3.29	13.78	1.67
	重庆	0.21	0.14	0.22	4.52	0.38	0.42	0.46	11.75
	贵州	0.67	0.54	0.86	0.28	0.79	0.61	0.95	0.30
	云南	0.58	0.38	0.56	0.52	0.67	0.47	0.55	0.45
	西藏	0.03	0.01	0.06	0.13	0.03	0.01	0.07	0.05
	小计	5.18	3.17	8.59	6.98	5.44	4.80	15.81	14.22
西北	陕西	3.62	2.68	3.94	3.14	3.28	2.32	3.13	2.78
	甘肃	1.66	1.70	2.51	0.92	1.39	1.53	2.08	0.72
	宁夏	0.62	0.46	1.00	0.12	0.76	0.39	0.79	0.18
	新疆	1.15	0.90	1.84	0.55	1.59	0.72	2.47	0.52
	青海	0.41	0.26	0.75	0.17	0.51	0.16	0.88	0.10
	小计	7.46	6.00	10.04	4.90	7.53	5.12	9.35	4.30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三) 各类人口的教育文化程度

表 3 各类初婚人口的教育文化程度分布 (%)

		小学及以下	初中	技校/职高/中专	高中	专科/本科	研究生
男性	本地人口	1.29	12.52	18.68	11.50	52.67	3.34
	迁移人口	0.09	0.88	0.96	1.31	45.34	51.42
	流动人口	3.68	16.28	4.90	7.79	55.91	11.45
	#一次流动	4.22	18.69	5.50	8.85	54.69	8.06
	#辗转流动	0.39	1.68	1.29	1.34	63.31	31.99
	总体	1.31	10.36	12.58	8.78	51.97	15.00
女性	本地人口	0.98	7.61	17.12	8.59	62.27	3.43
	迁移人口	0.11	0.70	0.62	0.68	40.84	57.06
	流动人口	2.51	19.63	9.53	10.39	50.94	7.00
	#一次流动	2.66	20.91	10.04	10.98	50.34	5.08
	#辗转流动	0.77	4.03	3.25	3.16	58.28	30.50
	总体	1.35	10.52	11.89	7.92	55.33	12.99

表 3 显示了北京近年初婚人口的教育文化程度的分布情况,以北京本地人口作为比较基准,可见外来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总体的教育文化水平;特别是迁移人口,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高达 97%,一半以上的人具有研究生学历。

流动人口中,辗转流动者和一次流动者的学历分布差异显著,前者的教育水平明显更高,在分布上与迁移人口颇为相近,只不过高学历者以大学学历为主,而迁移人口以研究生学历为主;后者则展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一方面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较高(特别是男性,高学历者的比重比北京本地人口还要高),另一方面初中及以下的低学历人口的比重也是各类人口中最高的。

由于我们对各类人口的划分主要依据其户籍特征上的差异,因此不同地区户口“价值”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上述教育文化水平的分布特点。在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户口承载着买房、养老、子女教育等很多福利相关的“附加价值”,越是大城市户口越具有价值,而户口在地区间的转移也通常是个体基于“价值提升”原则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近年来北京的人口急剧膨胀,外来人口进京门槛也日益提高,通常只有比较高端的优秀人才才能获得落户机会,迁移人口的高学历即体现了这一点。辗转流动人口虽然暂不具有北京户口,但曾迁移落户于其他地区,特别是上海、天津、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通常也需具备较高的教育文化水平。一次流动人口的学历分布则充分折射出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类型和层次多样性的特点,其中既有文化水平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有大学毕业的低收入群体,更高学历的公司“白领”亦不在少数,另外还有文化水平分布在各个层级的“北漂”等等。

## (四) 各类人口的职业类别

职业类别和等级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个体社会地位的高低,一些经验研究往往将职业作为等级变量处理,比如林南和边燕杰(2002)在分析中国城市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过程时将职业序列从低至高排列为农业、商业、制造业、服务业、办公室工作、行政与管理、专业与技术工作,张翼(2003)在综合评价权力、收入等因素的基础上将职业阶层从低至高定义为粮农阶层、农村专业户阶层、采掘业和制造业阶层、商业服务业阶层、办公室办事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官员和私有业主阶层。本研究参照既有研究的做法同时结合数据库中的变量定义,将职业类别划分为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等 7 类,诸如自由职业者、非正规就业者等不便归类的职业归入“其他”,具体的分布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类初婚人口的职业类别分布 (%)

		公务员	专业技术人员	普通办事人员	商业及服务业人员	生产、运输操作人员	农林牧渔业从业者	其他
男性	本地人口	5.50	36.63	14.15	4.52	11.13	13.05	15.01
	迁移人口	17.00	47.69	13.05	0.99	7.71	0.11	13.46
	流动人口	3.89	41.77	13.44	5.30	3.72	18.33	13.55
	#一次流动	3.29	39.34	13.29	5.84	3.97	21.11	13.16
	#辗转流动	7.54	56.51	14.34	2.05	2.23	1.51	15.82
	总体	7.75	39.75	13.81	3.87	8.00	11.01	15.81
女性	本地人口	4.46	44.37	15.69	3.87	5.98	10.58	15.05
	迁移人口	14.53	49.52	14.77	1.32	1.17	0.17	18.53
	流动人口	2.56	38.17	13.06	4.47	3.06	20.96	17.72
	#一次流动	2.33	36.99	12.89	4.63	3.14	22.47	17.55
	#辗转流动	5.39	52.54	15.19	2.44	2.07	2.49	19.89
	总体	5.35	43.05	14.66	3.68	4.26	12.51	16.48

各类人口在职业类别的分布上表现出与教育程度分布相类似的特点,迁移人口中有超过6成的人从业于“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两类社会地位和阶层序列较高的职业,其次为辗转流动人口;一次流动人口在以上两类职业中的比重相对较低,而分布在“农林牧渔业从业者”这一较低阶层序列职业中的比重却是最高,此外,一次流动人口在职业类别分布上的分散度也是最高的。

#### (五) 各类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

在表5中,我们计算了2004年以来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性别对比来看,男性的初婚年龄时序变动不大,特别是本地人口;而女性的初婚年龄则明显推迟,在9年中总体平均提高了1岁多。在各类人口中,北京本地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是最低的,而辗转流动人口则婚龄最高。

表 5 北京近年各类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 (%)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总体
男性	本地人口	27.82	27.88	27.69	27.84	27.87	27.73	27.84	27.92	27.86	27.82
	迁移人口	28.24	28.48	28.37	28.42	28.43	28.43	28.47	28.63	28.73	28.49
	流动人口	27.96	28.20	28.23	28.41	28.74	28.61	28.84	28.85	28.95	28.59
	#一次流动	27.92	28.15	28.15	28.35	28.71	28.58	28.84	28.83	28.91	28.55
	#辗转流动	28.18	28.56	28.70	28.78	28.95	28.83	28.86	28.98	29.17	28.84
	总体	27.91	28.02	27.92	28.03	28.10	28.01	28.15	28.24	28.24	28.07
女性	本地人口	25.43	25.54	25.72	25.82	26.03	26.07	26.17	26.43	26.48	26.00
	迁移人口	26.46	26.87	26.91	27.03	27.23	27.31	27.54	27.70	27.83	27.28
	流动人口	25.71	25.69	25.88	25.98	26.17	26.25	26.41	26.64	26.78	26.22
	#一次流动	25.61	25.60	25.80	25.89	26.08	26.15	26.30	26.54	26.67	26.12
	#辗转流动	26.93	27.01	27.04	27.26	27.39	27.35	27.66	27.81	27.96	27.44
	总体	25.68	25.79	25.97	26.08	26.28	26.33	26.47	26.72	26.82	26.28

社会选择理论认为,外出流动人口通常文化程度较高、适应能力和事业心较强,并有强烈的发展愿望,因而也更倾向于晚婚(Kahn,1988)。表3至表5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理论。一

方面在大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岗位通常需要较高的学历或较长工作年限,另一方面迁移成本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即人们通常先要有稳定的生活(如解决住房、收入来源等问题),才会比较从容地步入婚姻。相对而言,本地人口在就业和住房方面的压力较小,因而其初婚年龄也相应较低。

#### 四、初婚外来人口的婚姻匹配特征

##### (一)不同人口类型的夫妇匹配情况

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近年来北京市总体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基于夫妇户籍匹配的统计分布结果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由于双方有一方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即可在北京登记结婚,因此新婚夫妇按照各自的人口流迁类型可以形成如表6所示的8大类组合形式;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到,北京本地青年男女之间的结合仍是新婚人群的主体,总体上占41%,而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相结合的“外来夫妇”的比重达到23.3%。

具体来看,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夫妇组合主要是与流动人口(特别是一次流动人口)的结合,同迁移人口相结合的比重并不高,“本地男+迁移女”和“迁移男+本地女”的组合总体上只占比6.1%;2010年左右随着进京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本地人口之间以及本地人口与迁移人口之间的婚配比重也有所回升。

表6 北京近年不同匹配类型的初婚夫妇数量分布及变动 (%)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总体
本地男+本地女	45.35	40.99	45.92	39.33	39.25	40.29	37.74	39.08	40.62	40.95
本地男+迁移女	3.79	2.58	2.89	2.56	2.44	2.37	2.16	2.48	2.54	2.62
本地男+流动女	21.16	24.95	20.12	22.96	21.96	20.85	21.65	19.25	18.18	20.88
#本地男+一次流动女	20.22	24.07	19.35	22.15	21.14	20.08	20.89	18.45	17.46	20.08
#本地男+辗转流动女	0.94	0.88	0.77	0.81	0.82	0.77	0.76	0.80	0.72	0.80
迁移男+本地女	4.55	3.65	4.03	3.52	3.14	3.09	3.17	3.40	3.36	3.51
迁移男+迁移女	7.30	7.58	8.95	8.79	8.76	8.40	7.92	8.66	8.80	8.42
迁移男+流动女	6.78	7.45	6.79	9.09	10.38	10.77	12.88	12.9	12.58	10.22
#迁移男+一次流动女	5.69	6.25	5.70	7.51	8.65	8.92	10.86	10.94	10.78	8.59
#迁移男+辗转流动女	1.09	1.20	1.09	1.58	1.73	1.85	2.02	1.96	1.80	1.63
流动男+本地女	8.08	9.30	8.03	9.35	9.12	8.96	9.28	8.61	8.09	8.70
#一次流动男+本地女	7.44	8.64	7.42	8.67	8.45	8.25	8.53	7.85	7.34	8.01
#辗转流动男+本地女	0.64	0.66	0.61	0.68	0.67	0.71	0.75	0.76	0.75	0.69
流动男+迁移女	3.01	3.50	3.28	4.40	4.94	5.26	5.19	5.62	5.83	4.68
#一次流动男+迁移女	2.09	2.48	2.36	3.20	3.54	3.79	3.75	4.07	4.23	3.37
#辗转流动男+迁移女	0.92	1.02	0.92	1.20	1.40	1.47	1.44	1.55	1.60	1.31
合计(频数)	89146	67755	125530	82311	107844	136799	101155	130568	129440	970548

注:为简化表式,仅在“合计”一行给出了频数,其余各行均为列向百分比的数值,具体的频数可通过计算得到。

##### (二)教育程度的匹配

根据婚姻的同类匹配理论,夫妇双方通常具有相近的教育文化水平。表7基于夫妇匹配的视角分别计算了各类人口的配偶的教育程度分布情况,结果印证了这一理论的观点。从表3的结果我们已经了解到,就各类人口自身的教育程度分布来说,迁移人口是最偏向高学历端,其次为辗转流动人口;结合表7可以看到,与迁移人口相结合的各类人口的教育程度分布也最为偏向高学历端(其中尤以“迁移男+迁移女”的组合最为突出),与辗转流动人口相结合者的学历分布情况也类似。

表 7 夫妇匹配视角下各类人口的配偶的教育程度分布 (%)

		小学及以下	初中	技校/职高/中专	高中	专科/本科	研究生
男性	本地男 + 本地女	0.84	9.17	19.31	10.14	58.00	2.55
	本地男 + 迁移女	0.27	2.83	5.43	3.36	67.62	20.50
	本地男 + 流动女	1.28	18.31	20.44	14.27	42.84	2.86
	#本地男 + 一次流动女	1.30	18.76	20.85	14.50	42.04	2.54
	#本地男 + 辗转流动女	0.72	7.02	10.19	8.41	62.93	10.73
	迁移男 + 本地女	0.21	1.35	1.88	1.88	58.33	36.34
	迁移男 + 迁移女	0.03	0.04	0.09	0.09	35.06	64.69
	迁移男 + 流动女	0.07	1.36	1.35	2.06	49.06	46.10
	#迁移男 + 一次流动女	0.08	1.57	1.55	2.37	50.96	43.47
	#迁移男 + 辗转流动女	0.05	0.22	0.31	0.42	39.00	60.01
	流动男 + 本地女	3.79	22.14	6.99	10.66	51.61	4.82
	#一次流动男 + 本地女	4.05	23.74	7.33	11.32	49.72	3.84
	#辗转流动男 + 本地女	0.82	3.69	3.01	2.97	73.39	16.13
	流动男 + 迁移女	0.15	1.30	1.08	1.58	69.86	26.03
	#一次流动男 + 迁移女	0.20	1.69	1.38	2.10	74.50	20.13
	#辗转流动男 + 迁移女	0.03	0.27	0.30	0.27	57.94	41.19
女性	本地男 + 本地女	0.86	7.19	18.83	8.75	62.16	2.22
	本地男 + 迁移女	0.46	3.09	2.28	2.26	57.46	34.45
	本地男 + 流动女	3.54	26.96	12.06	13.07	42.31	2.06
	#本地男 + 一次流动女	3.61	27.68	12.27	13.34	41.43	1.67
	#本地男 + 辗转流动女	1.74	8.75	6.94	6.45	64.37	11.75
	迁移男 + 本地女	0.15	1.28	5.56	2.35	75.95	14.71
	迁移男 + 迁移女	0.03	0.05	0.10	0.10	34.02	65.70
	迁移男 + 流动女	0.27	2.65	3.52	2.93	71.55	19.09
	#迁移男 + 一次流动女	0.31	3.10	4.02	3.39	74.61	14.58
	#迁移男 + 辗转流动女	0.04	0.28	0.87	0.50	55.37	42.93
	流动男 + 本地女	1.96	12.12	15.97	9.88	55.92	4.15
	#一次流动男 + 本地女	2.09	12.92	16.75	10.40	54.27	3.56
	#辗转流动男 + 本地女	0.40	2.88	7.00	3.86	74.83	11.03
	流动男 + 迁移女	0.04	0.40	0.56	0.63	42.58	55.79
	#一次流动男 + 迁移女	0.04	0.47	0.72	0.79	45.55	52.43
	#辗转流动男 + 迁移女	0.02	0.24	0.17	0.22	34.95	64.40

值得注意的是,学历分布最为分散的一次流动人口在教育匹配的分布上也趋向两端——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与迁移人口相结合者的学历分布都偏向高端,而与本地人口相结合者的学历分布都偏向低端;本地人口也表现出类似的“分化”特征,与迁移人口及辗转流动人口相结合者的学历分布偏高,而与一次流动人口相结合者的学历分布偏低。男性中低文化程度比重最高的是与本地女结合的一次流动男其次是与一次流动女结合的本地男;与之相应,女性中低文化程度比重最高的是与本地男结合的一次流动女其次是与一次流动男结合的本地女。

### (三) 职业类别的匹配

在表 8 中,我们基于夫妇匹配的视角分别计算了各类人口的配偶的职业类别分布情况。通常

来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职业地位和相应的社会阶层也越高(Blau & Duncan,1967),而表8所示的分布特征确实展现出与表7高度的一致性。表8与表4相结合也再次印证了夫妇在职业类别上的“同类匹配”。

表8 夫妇匹配视角下各类人口的配偶的职业类型分布 (%)

		公务员	专业技术人员	普通办事人员	商业及服务业人员	生产、运输操作人员	农林牧渔业从业者	其他
男性	本地男+本地女	6.16	39.32	15.10	4.18	11.52	9.67	14.05
	本地男+迁移女	14.42	50.05	14.56	4.09	4.42	1.02	11.43
	本地男+流动女	3.34	31.64	12.19	5.14	11.00	19.90	16.80
	#本地男+一次流动女	3.19	31.05	12.11	5.19	11.16	20.46	16.84
	#本地男+辗转流动女	7.16	46.52	14.29	3.83	6.93	5.77	15.51
	迁移男+本地女	19.39	48.04	12.13	1.84	3.41	0.23	14.96
	迁移男+迁移女	19.42	47.71	11.71	0.60	1.04	0.01	19.50
	迁移男+流动女	14.34	48.10	13.78	0.97	1.94	0.13	20.74
	#迁移男+一次流动女	14.07	47.56	13.85	1.04	2.07	0.14	21.28
	#迁移男+辗转流动女	15.77	50.99	13.43	0.58	1.28	0.08	17.88
	流动男+本地女	2.80	35.71	12.22	6.35	4.78	24.56	13.58
	#一次流动男+本地女	2.46	34.24	12.01	6.64	4.86	26.40	13.39
	#辗转流动男+本地女	6.72	52.67	14.62	3.07	3.87	3.31	15.73
	流动男+迁移女	6.35	57.78	16.59	3.08	1.71	1.76	12.74
	#一次流动男+迁移女	5.69	57.36	17.34	3.75	1.85	2.34	11.67
#辗转流动男+迁移女	8.04	58.84	14.67	1.37	1.33	0.27	15.47	
女性	本地男+本地女	4.10	44.54	16.01	3.84	6.68	10.13	14.70
	本地男+迁移女	13.74	51.39	14.76	3.75	2.15	0.59	13.61
	本地男+流动女	1.59	31.31	11.60	5.26	3.88	30.36	16.00
	#本地男+一次流动女	1.48	30.65	11.46	5.30	3.89	31.33	15.89
	#本地男+辗转流动女	4.37	47.95	15.03	4.12	3.62	6.08	18.82
	迁移男+本地女	11.45	55.26	15.94	2.20	3.06	1.36	10.72
	迁移男+迁移女	16.62	47.47	13.20	0.61	0.91	0.02	21.17
	迁移男+流动女	4.52	53.96	18.65	2.40	1.43	3.70	15.34
	#迁移男+一次流动女	4.23	53.53	19.04	2.61	1.49	4.36	14.75
	#迁移男+辗转流动女	6.05	56.21	16.58	1.30	1.13	0.24	18.49
	流动男+本地女	2.84	39.14	14.38	4.81	4.46	17.25	17.12
	#一次流动男+本地女	2.59	37.97	14.08	4.99	4.55	18.31	17.52
	#辗转流动男+本地女	5.71	52.63	17.87	2.77	3.35	5.10	12.55
	流动男+迁移女	11.34	52.29	17.53	1.23	1.01	0.19	16.40
	#一次流动男+迁移女	10.80	52.57	18.07	1.40	1.12	0.18	15.86
#辗转流动男+迁移女	12.74	51.58	16.13	0.78	0.75	0.21	17.80	

作为职业类别分布最偏向高端序列的迁移人口,其配偶的职业类别也基本分布在高端序列中;辗转流动人口的情形与之相仿,只不过职业类别的分布略向低端序列偏移。与教育程度的匹配相类似,职业类别分布最为分散的一次流动人口,在职业序列匹配的分布上也趋向了两端——不论男

性还是女性,与迁移人口相结合者的职业序列分布都偏向高端,而与本地人口相结合者的职业序列分布都偏向低端。本地人口的情形也与之类似,与迁移人口及辗转流动人口相结合者的职业序列分布偏向高端,而与一次流动人口相结合者的职业序列分布偏向低端。男性中在较低职业序列的分布比重较高的是与本地女结合的一次流动男以及与一次流动女结合的本地男;与之相应,女性中在较低职业序列的分布比重较高的是与本地男结合的一次流动女以及与一次流动男结合的本地女。

## 五、主要结论和启示

本文基于2004-2012年的北京市婚姻登记数据对北京外来人口的婚配特点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到年轻人的大量涌入对本地婚姻市场所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了解到大城市青年男女在流迁与婚姻决策中所展现出的独特特征。

总体来看,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多,北京本地的适婚女性在婚姻交往中受到一定的挤压。在人口正常变动的情况下,北京本地适婚男女的数量应该是大致相当的,但基于表1进行计算不难看到,近9年的北京初婚人口中,本地男的数量超出本地女10万7千余人,这意味着大量处于适婚年龄的本地女性尚处于未婚状态。另外从表6还可看到,“本地男+流动女”组合的比重高达21%,仅次于本地男女之间的婚配,而且迁移男同迁移女、流动女相结合的比重也均高于其与本地女相结合的比重。可见在婚姻梯度的作用下,外来人口的流入给大城市男性带来更多婚姻选择,也对本地女性的婚配形成了挤压。

从具体的匹配模式来看,如果说“本地男+本地女”的组合代表了北京市青年男女婚姻匹配的一种平均或者普遍状态,那么外来人口的加入则使最终的婚配状态呈现出不同的“层次”。从表7和表8的分布结果可以看出,迁移人口之间以及迁移人口与辗转流动人口之间普遍为“高知”和“高职”的组合,一次流动人口中教育程度和职业序列偏向高端分布的人群也大多与迁移人口结合,而偏向低端分布的人群则大多与本地人口结合。这意味着一次流动人口对北京本地的婚姻市场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但主要是针对婚配中的弱势人群。有研究指出,教育文化程度越高、职业越稳定的城市新移民,其社会融合程度也越高,并且更可能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习惯和价值观念而在移居地很好地生活(张文宏等,2008),再加上北京高度包容的文化特点,对于高端组合的外来夫妇而言,适应和融入北京的生活应该不是大问题。但是对于偏向低端的一次流动人口与北京本地人口的夫妇组合,外来一方因户籍、教育程度、职业稳定性等方面的弱势而可能面临的社会排斥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婚姻与迁移的互动关系来讲,传统观点通常认为“男主女从”,即婚姻是女性流迁的动力;流迁往往通过其他生命事件(主要是就业)影响男性的婚姻,但对女性而言却是独立于其他生命事件直接影响其婚姻(Aree,2006)。我们针对北京近年初婚人口的分析表明,情况并不尽然。从表3和表4我们不难看出,外来人口中的迁移人口和辗转流动人口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并且分布在较高的职业类别序列中,这一点并未表现出性别差异,女性迁移人口在“研究生”这一高学历上的分布比重甚至比男性迁移人口还要高出近6个百分点。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层级通常也意味着较高的独立自主性,从而在婚姻关系中不致成为“依附”的一方,特别是对已经落户于北京的迁移人口而言。对这一群体来讲,流迁首先源自求学、就业等个人发展方面的因素,婚姻则更多是流迁过程中的人生收获;“借助于同当地人的婚姻而落户北京”的情况在这一人群中应不多见。事实上,从匹配的视角也可看到,迁移人口和辗转流动人口同本地人的婚配比重都不高,更多是外来者之间相互结合(包括迁移人口与较高文化和职业层级的一次流动人口的组合)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强结合”的“外来新移民”家庭群体。

由于在大城市没有常住户口会有诸多不便,婚后很多事务不得不依赖于有户口的一方,因此流动人口在婚配中通常是较为弱势的;而从我们的分析结果来看,新婚人群中男女流动人口的数量相

差并不悬殊,“流动男+迁移女”的组合为数不少且比重还在逐年上升。特别是男性辗转流动人口,尽管其绝对数量仍然低于女性辗转流动人口,但数量和比重均呈上升趋势,说明男性亦可以“随爱而动”,为了婚姻和家庭从其他城市再一次迁移。

在我国青年择偶和婚配过程中,尽管“男主女从”的主流传统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从北京外来人口的婚配特征来看,男女双方在婚恋与迁移决策中的地位显然更加平等,女性未必是“追随”的一方,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层次所带来的经济独立和地位平衡,从而使双方可以从家庭整体的角度出发做出最有利的决策。

## 参考文献:

- 蔡昉,2002,《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城乡就业问题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范芝芬,2013,《流动中国:迁移、国家和家庭》,邱幼云、黄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雷洁琼主编,1994,《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转型期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 林明鲜、申顺芬,2006,《婚姻行为中的资源与交换——以延边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为例》,《人口研究》第3期。
- 林南、边燕杰,2002,《中国城市中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过程》,载于边燕杰等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倪晓峰,2007,《大城市婚姻迁移的区域特征与性别差异——以广州市为例》,《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宋月萍、张龙龙、段成荣,2012,《传统、冲击与嬗变——新生代农民工婚育行为探析》,《人口与经济》第6期。
- 张文宏、雷开春,2008,《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张翼,2003,《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周皓、李丁,2009,《我国不同省份通婚圈概况及其历史变化——将人口学引入通婚圈的研究》,《开放时代》第7期。
- Jampaklay, Aree 2006, “How Does Leaving Home Affect Marital Timing? An Event-History Analysis of Migration and Marriage in Nang Rong, Thailand”, *Demography*. Vol. 43(4).
- Becker, Gary S. 1973,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1(4).
- Bernard, J. 1982, *the Future of Marri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lau, P. M.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Wiley.
- Blau, P. M. and Duncan, O. D. 1967,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Fan, C. 1999, “Migration in a Socialist Transitional Economy: Heterogeneity, Socioeconomic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in China and Guangdong Provi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3(4).
- Humbek, Eva 1996,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Identity: Thai Women in Germany”, in Garcia-Ramon, Maria Dolores and Monk, Janice (eds), *Wome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olitics of Work and Daily Life*. London: Routledge.
- Kahn, J. R. 1988, “Immigrant Selectivity and Fertility Adap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vol. 67(1).
- Lavelly, W. 1991, “Marriage and mobility under rural collectivization”, in Rubie S. Watson and Patrick Buckley Ebrey (eds),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ulder, Clara H. & Wagner, Michael 1993, “Migration and Marriage in the Life Course: A Method for Studying Synchronized Ev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Vol. 9(1).
- Piper, Nicola 1999, “Labor Migration, Trafficking and International Marriage: Female Cross-Border Movements into Japan”,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Vol. 5(2).
- Rosenzweig, Mark R. & Stark, Oded 1989, “Consumption Smoothing, Migration and Marriage: 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7(4).
- Watts, Susan J. 1983, “Marriage Migration, a Neglected Form of Long-term Mobility: A Case Study from Ilorin, Niger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17(4).
- Willekens, Frans 1987,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Micro-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 22(2).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责任编辑:陈 昕